

## 第二国际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争论及理论启示

谢亚洲, 杨景钦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甘肃兰州, 730000)

**摘要:** 第二国际时期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交锋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重要节点。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错误地将辩证法视为马克思理论体系的缺陷。对此, 普列汉诺夫、阿德勒、考茨基等正统派理论家从存在论基础、量变质变规律及矛盾规律等维度展开系统辩驳, 强调辩证法作为科学研究方法与革命行动指南的双重属性。然而, 他们在捍卫辩证法科学性的同时, 却因未能领会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性变革, 而对辩证法的理解发生了偏离。普列汉诺夫将辩证矛盾等同于自然运动现象, 使辩证法趋向机械决定论; 阿德勒则剥离辩证法的存在论内涵, 将其窄化为纯粹的认识论工具; 考茨基更是将辩证法混同于进化论, 以渐进演化取代了革命的飞跃。要完整把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需立足三个维度: 在存在论维度, 回归实践哲学的本体论变革, 确认主体性实践对客观世界的构序作用; 在认识论维度, 重构辩证法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性, 揭示其作为批判性认识的本质; 在现实维度, 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 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运用和发展辩证法。

**关键词:** 第二国际; 辩证法; 普列汉诺夫; 马克思·阿德勒; 革命

**中图分类号:** B024; D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6)01-0020-12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在西欧资本主义短暂繁荣与社会主义运动面临新挑战的双重背景下, 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围绕辩证法展开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并没有引起后世太多学者的关注。一方面是受苏联意识形态的影响, 列宁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定性导致这场争论长期被简化为“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对立”; 另一方面是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遮蔽, 卢卡奇、葛兰西等人对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的定性和批判, 使得原初关于辩证法争论的历史语境被边缘化。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sup>[1]</sup>, 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方法论, 对辩证法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因此, 要想真正理解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多重阐释路径, 厘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内在逻辑, 就不得不重新审视这场关于辩证法的争论。

第二国际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争论始于伯恩斯坦。1899年, 伯恩斯坦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在书中, 他认为辩证法存在致命缺陷, 即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基本法则相违背, 以概念运动来取代现实过程, 使得理论和实际之间出现了脱节。他提议应当将辩证法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剔除”出去。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批判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转向的核心理论事件, 其理论错误不仅源于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误读, 更是由于当时帝国主义阶段阶级结构的复杂变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以及社会主义运动遇到的挑战。伯恩斯坦对辩证法的质疑虽以马克思为名, 实则主要针对恩格斯体系化的辩证法理论。他将恩格斯所强调的“自然辩证法”与

收稿日期: 2025-03-1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自然辩证法中国化及当代创新研究”(20&ZD043)

作者简介: 谢亚洲, 男, 甘肃环县人, 哲学博士,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国外马克思主义; 杨景钦, 男, 安徽宿州人,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联系邮箱: 2205662310@qq.com

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混为一谈, 否定了辩证法本身的科学性。不过, 伯恩斯坦的质疑也是马克思主义自我更新的必要环节。正如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所说, 伯恩斯坦并未使我们丧失信心, 而是迫使我们思考, 为此我们应该感谢他。本文将目光聚焦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围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产生的四个核心争论之上: 存在论基础、量变质变规律、矛盾规律, 以及辩证法的适用范围与现实意义。

##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存在论基础的争论

在伯恩斯坦看来, 辩证法以概念运动代替现实过程, 是一种脱离现实的错误思维方式。他指出, 辩证法在自然科学中已经得到广泛认可, 对自然科学构成的危险是比较小的, 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情况就不同了”<sup>[2](235)</sup>。无论现实世界呈现出何种面貌, 只要我们脱离直观感知和经验验证的坚实基础开始抽象思辨, 超脱具体事实在意识层面上构建理论体系, 那么, 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踏入衍生概念构筑的知识领域。此时, 倘若盲目遵照辩证法则展开思考, 极有可能在无意识中卷入所谓“概念的自我发展”的虚幻漩涡, 陷入主观臆断与逻辑自洽的封闭循环之中, 从而丧失科学探究的根本立足点。伯恩斯坦批评道, 那些将辩证法视为万能钥匙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先预设所有发展都必然经历辩证阶段, 继而从结果反推过程的“必然性”。辩证法的公式化应用存在隐含危机, 其固有模式促使人们在分析具体情境时倾向于过度概括或简化对象特征, 导致对事物独特属性的认识模糊不清。伯恩斯坦强调经验验证优先于思辨演绎, 他对“概念运动替代现实过程”的批判, 也直指当时盛行的辩证决定论的弊端。然而, 伯恩斯坦所批判的“辩证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指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中构建的辩证法体系, 丝毫没有注意到马克思所强调的历史主体性与实践构序性。

第二国际的大部分理论家, 如梅林、普列汉诺夫等, 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客观的、唯物主义的, 是以现实的历史过程作为依据的。对梅林来说, 辩证的思维是辩证的现实——历史的反映。梅林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几点意见》中认为: “只是在历史的现实进程中找到了辩证的联系……即使从来没有过德国哲学, 要是没有辩证的思维毕竟是既不能创作也不能论述历史。”<sup>[3]</sup>普列汉诺夫将辩证法视为客观世界的镜像存在, 认为辩证法深刻地映射了自然界与社会发展进程中那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并在人类思维的概念体系中得以体现与再现。在普列汉诺夫看来, 基于物质本体论构建起来的世界观构成了辩证法的基石<sup>[4](87)</sup>。换言之, 辩证法根植于这一科学自然观之上, 倘若唯物主义遭到颠覆, 则势必动摇辩证法存在的合法性根基, 使其丧失合理性和有效性。他认为, 辩证法不仅是一种思维方式, 还代表了存在本身的一种特质。对普列汉诺夫来说, 正是存在的辩证属性承载着辩证思维。为了支持这一观点, 普列汉诺夫用运动中的矛盾以及“成为”中的矛盾来证明。普列汉诺夫通过对运动现象的分析来揭示形式逻辑的局限性, 即当运动物体通过某空间点时, 必然处于同时“在此位置”与“不在此位置”的悖论性状态。这种实存矛盾迫使思维突破“是一是, 否一否”的静态逻辑框架, 采用“是一否, 否一是”的辩证判断模式<sup>[4](81)</sup>。在“成为”的维度上, 普列汉诺夫论证了任何生成过程都内在地包含量变与质变的矛盾统一, 这种连续性中断使得精确划分发展阶段的努力必然失败。普列汉诺夫通过揭示形式逻辑在动态现象面前的失效, 确证了辩证法的存在论基础。然而, 他将运动中的对立统一等同于形式逻辑矛盾, 混淆了辩证矛盾与逻辑矛盾的本质。考茨基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中认为: “在黑格尔那里, 辩证法是推动世界并促使历史发展的精神的自己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它唯物主义化了, 把它改变为既是物质世界的、也是思维世界的运动规律了。”<sup>[5](141-142)</sup>在考茨基看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保留了辩证法的动态矛盾内核, 但颠覆了其存在论基础, 使其唯物主义化。

相比于梅林、普列汉诺夫等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以现实的历史为依据的,马克思·阿德勒则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有效性无需绑定任何形而上学(包括唯物主义),其生命力源于辩证法的方法论革新。阿德勒指出,普列汉诺夫错误地将辩证法的基础建立在唯物主义自然观上,这会导致马克思主义陷入形而上学。在他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辩证法视为一种研究方法,而非存在本身的属性。普列汉诺夫试图通过运动的矛盾性来证明辩证法的自然属性,但阿德勒认为这种论证存在问题,因为运动本身并不矛盾,是概念与感知之间的错位导致的误解<sup>[6]</sup>。运动作为感性直观的连续体并不是现实本身的矛盾。阿德勒指责普列汉诺夫混淆了逻辑分析与经验事实。在阿德勒看来,辩证法具有双重内涵:一是作为思维方法的辩证法,二是作为形而上学的辩证法。作为思维方法的辩证法是一种动态的思维方式,强调通过矛盾与联系打破思想的僵化;作为形而上学的辩证法不再局限于方法论,而是成为对世界本质的断言,即存在本身具有辩证结构。在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两种含义是统一的。辩证法既是思维方法,也是存在本身的演化过程。矛盾不是需要消除的“错误”,而是推动发展的内在动力。马克思拒绝将辩证法视为“存在本身的属性”。阿德勒强调,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而非形而上学<sup>[6]</sup>。马克思将辩证法从黑格尔的思辨体系中剥离,将其转化为历史与社会研究的工具,使辩证法真正成为“批判的武器”。马克思强调“存在决定意识”,辩证法需以物质条件为基础,而非预设某种形而上学的矛盾本体。阿德勒强调,辩证法生命力在于其方法论意义——将社会现象置于历史过程中解剖,而非将其绝对化为某种“自然法则”<sup>[6]</sup>。

在分析辩证法的基础存在论时,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陷入了传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之中。由于未区分恩格斯对普遍规律的抽象与马克思对历史特殊性的聚焦,普列汉诺夫直接将物质本体论当作辩证法的理论基石,忽视了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强调的“主体实践对生产关系的构序作用”。普列汉诺夫强调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础存在论是唯物主义,批判修正主义对辩证法的歪曲。但是他以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为基础,将辩证法降格为“形式方法”,视辩证法为现象矛盾的机械叠加,忽视了对立面的动态统一与斗争。正如列宁所说,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即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问题没有足够的重视,而是把它们归结为“实例的总和”<sup>[7](305)</sup>。这就导致普列汉诺夫在哲学上丧失了原则立场,在科学上屈从于以实证主义为本质特征的知性科学。阿德勒剥离了辩证法的基础存在论负载,强调辩证法的方法论意义,将其定位为对逻辑思维的补充与修正。阿德勒的批判揭示了辩证法应用中常见的误区,即混淆方法论与存在论,将语言矛盾等同于存在矛盾。阿德勒的贡献在于呼吁回归辩证法的工具性本质,避免其沦为形而上学的教条。然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生命力正源于其“方法论与存在论的统一”,它既是分析工具,也承认矛盾是物质世界的根本属性。正如雷恩-雷特尔所说,辩证法既不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思维当中,也不作为历史事实性的一部分存在于历史当中,而是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所能观察到的主体与客体、社会存在与意识的实践统一之中<sup>[8]</sup>。这种统一恰恰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辩证本质。可见,在辩证法的基础存在论问题上,无论是普列汉诺夫将辩证法降格为对自然运动现象的机械反映(割裂方法论与世界观),还是阿德勒彻底剥离其基础存在论内涵、将其纯化为认识论工具,都未能实现方法论、认识论与存在论的统一。这种割裂不仅未能超越传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更削弱了辩证法作为“批判武器”所依赖的实践根基,为后续争论埋下了理论隐患。

##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量变与质变”的争论

对“量变与质变”的理解关系到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在现实中对革命和改良、斗争与妥协的态度,

也基本奠定了左派、右派和中间派的立场。伯恩斯坦否认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伯恩斯坦认为, 辩证法这种矛盾的逻辑学, 是以漠视形式逻辑的第一命题( $A=A$ )为基础的逻辑学。辩证法以“是一否和否一是”代替“是一是和否一否”, “它的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和从量到质的转化, 以及其他的辩证法的妙语(Schönheiten), 一再妨碍对已经认识的变化的影响作出充分的说明”<sup>[9](245-246)</sup>。当我们的认知遭遇难以逾越的局限时, 我们倾向于将那些恰好位于认知边界上的各种事物间的关联视为一种超越我们当前理解范畴的“自在之物”, 进而摆脱辩证法的全部暧昧不明之处。伯恩斯坦提醒人们注意: 将具体历史情境强行纳入量变与质变框架, 可能导致对现实复杂性的遮蔽。伯恩斯坦提出“和平长入”的政治策略来应对 19 世纪末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能力的不断增强。值得注意的是,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明确将量变质变规律视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法则。伯恩斯坦的否定不仅是对革命跃迁的拒绝, 也是对恩格斯辩证法体系的全面质疑。

卢森堡认为, 量变与质变存在着本质区别。革命的“全部秘密正在于由单纯的量变为新质, 具体地说, 在于从一个历史时期、一个社会制度过渡到另一个历史时期、另一个社会制度”<sup>[10](130)</sup>。在卢森堡看来, 历史发展中的改良(如工人权益的局部改善、经济政策的调整)是量变的体现, 这些变化在资本主义框架内逐步积累, 但无法突破制度的根本矛盾。革命是量变积累到临界点后的必然质变, 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制度性跃迁。这种质变不是简单的“改良的延伸”, 而是全新的社会形态的诞生, 如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经济等。卢森堡反对将历史简化为线性量变。在卢森堡看来, 当伯恩斯坦摒弃辩证思维, 转而采用“一方面……另一方面”“虽然……不过”等表述上的摇摆不定的修辞性转折连接词时, 其逻辑脉络已然滑向衰败资产阶级所奉行的历史决定论认知模式的深渊之中<sup>[10](142)</sup>。这种思维方式深刻映射了资产阶级社会现实与政治实践的精神内核, 成为其社会存在与政治风貌在意识形态层面的真实写照。伯恩斯坦用资本主义的适应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崩溃论, 他不但否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而且否定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sup>[11](327)</sup>。

普列汉诺夫通过分析“量变到质变”的辩证过程, 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渐进式“进化论”之间的本质区别。普列汉诺夫认为, 进化论是建立在“自然界和历史都没有飞跃, 而世界上的一切变化只是逐渐进行”<sup>[4](159)</sup>的原则之上的, 现代的进化论者的学说中存在大量的保守主义的气味; 然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则很清楚地知道, 不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的思想和历史中, 飞跃都不可避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当然也并不忽视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 即在一切变化的契机中都有同样的不间断的过程在起着作用, 辩证法只是努力去阐明逐渐的变化必然地过渡到飞跃的各种条件<sup>[12](497)</sup>。普列汉诺夫认为历史的跳跃和革命是必然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指出: “一般‘有’的变化并不是由一个量到另一个量的过渡, 而是由质到量、由量到质的过渡……这个过程是渐进的一个中断, 是对过去的‘限有’的一个质变。”<sup>[13](142)</sup>普列汉诺夫批判了伯恩斯坦对于辩证法中量变和质变的理解, 驳斥了其关于社会发展的渐进性观点。

阿德勒认为, 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变实际上是由于观察者在定性和定量思维之间的转换所导致的不连续性, 并不意味着自然本身存在内在的质变矛盾。当量的积累突破传统概念框架时, 即被观察者定义为质变。量变与质变并非割裂的两种状态, 而是同一发展过程的两个维度。自然界中几乎没有纯粹的“量变”, 因为任何微小的质量变化都意味着新事物的产生, 而新事物的出现必须通过“飞跃”才能融入时空与因果的连续性序列。“飞跃”并非事物固有的神秘属性, 而是人类认知结构的必然产物。阿德勒指出, 普列汉诺夫试图以“脱发导致秃顶”或“年轻人长胡子”为例证明自然本身的辩证性(即量变积累引发质变)。但阿德勒认为, 这些例子中的辩证性并非自然固有的, 而是人类通过定义和命名对连续发展过程进行人为切割的结果<sup>[14]</sup>。阿德勒将“量转化为质”的法则视为一种分析工具, 其功能在于揭示定性现象背后的定量基础。阿德勒将量变质变问题从存在论转向认识论, 揭示其本质是人

类认知对连续现实的概念化处理,为理解辩证法提供了新视角——辩证法不是描述自然规律,而是构建动态认知框架的方法论工具。

相比于卢森堡和普列汉诺夫的激进立场,以及伯恩斯坦的妥协立场,饶勒斯采取了一种调和立场。他主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与渐进式社会改良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共存的。饶勒斯认为,马克思自黑格尔处汲取灵感后提炼而成并将其巧妙运用于剖析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辩证法体系依旧具备极高的理论价值,与伯恩斯坦倡导我们践行的具体措施之间不存在任何实质抵触之处<sup>[15][151]</sup>。马克思从黑格尔辩证法中提炼的量变与质变法则,本质是对社会发展趋势的规律性把握,而非机械的暴力革命时间表,日常的工会斗争、议会改革等“量变”积累,既是资本主义矛盾深化的表现,也是质变(革命)的必要准备环节。饶勒斯主张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具有渐进性与模糊性的特质。在饶勒斯看来,一切伟大的社会革命的产生肯定都先要经过缓慢的准备,包括经济的变化、人民的反抗以及先进理论的指导。关键在于,我们通常很难准确地去把握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究竟是否已经成熟,我们缺少那种十分明确且无疑义的标识,因此就无法精准地判定实施革命干预的恰当时间。在资本主义朝着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阶段里,往往会有各式各样的社会形态充当桥梁的角色。我们应当保持辩证的视角与方法,持续以辩证思维剖析历史的驱动力,同时不摒弃那些积极、渐进、直接且高效的行动策略。此类行动策略,在当今已成为并将愈发显著地构成推动社会主义斗争与发展的核心法则,引领我们不断前行<sup>[15][152]</sup>。饶勒斯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并不排斥有组织的无产阶级采取直接的、持续的、日常的改良行动与干预措施,这些举措旨在逐步推动社会进步与变革。

在量变质变问题上,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呈现了多元但各有偏颇的理解,具体见表1。卢森堡强调质变的必然性却隐含绝对化倾向,普列汉诺夫承认飞跃但陷入机械宿命论,阿德勒将其完全主观化为认知框架转换(唯心主义倾向),而饶勒斯则滑向了改良优先的折中主义。这些阐释的共同缺陷在于未能将量变质变规律置于具体的历史实践进程中动态把握,或将其绝对化、机械化,或消解其客观物质基础,或模糊革命与改良的界限,未能充分体现辩证法在革命策略问题上的批判性与具体性。

表1 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关于量变与质变关系的研究及革命立场

理论家	量变与质变关系	革命立场	辩证法定位
伯恩斯坦	不存在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变	渐进改革: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否认辩证法的科学性、有效性
卢森堡	质变是资本矛盾不可调和的必然爆发(如帝国主义战争)	激进革命:反对任何妥协,强调自发性总罢工	历史客观规律
普列汉诺夫	质变是量变积累后的机械断裂(如生产力突破阈值)	革命宿命论:等待客观条件成熟	自然与社会统一法则
阿德勒	质变是认知框架的转换(如阶级意识觉醒)	渐进启蒙:通过教育推动意识质变	认识论工具
饶勒斯	质变是改良量变与革命干预的共同结果	调和立场:革命为最终目标,改良为现实路径	历史策略分析工具

###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矛盾”的争论

在“矛盾”问题上,伯恩斯坦否认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唯一驱动力,他认为相似力量间的“协同合作”同样构成了推动发展的不可小觑的强大力量<sup>[2][236]</sup>。在伯恩斯坦看来,将矛盾视为唯一的发展驱动

力在一定程度上是片面的, 如果“一切发展的动力是对立面的斗争”, 那么在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就不存在矛盾, 就不会再发展了? 在伯恩斯坦看来, 社会主义的改造, 可以通过改进和扩大今天已经运用于这一目的的那些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来实行, 也就是由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不一定要发展到残酷的斗争。当伯恩斯坦将辩证法简化为“矛盾调和论”, 用“协同进化”来替代矛盾动力论时, 他实际上取消了资本主义内在对抗性的存在论基础。这种妥协也最终导致社会民主党与资本主义的共谋, 而这种改良逻辑在 1914 年世界大战爆发时也瞬间瓦解。

普列汉诺夫认为矛盾是某一事物和概念运动的主要推动力, 而对于具有矛盾的运动过程必须用辩证逻辑来思考。一般地说, 所有的概念和现象的辩证运动, 即那种向前发展的运动, 都是基于其内部发展规律并通过其内部产生的矛盾而实现的。某一概念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矛盾, 某一现象的各种内在力量之间的相互对抗, 构成了我们在任何地方, 无论是在自然界、在逻辑中还是在历史上所观察到的一切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sup>[4](84)</sup>。在普列汉诺夫看来, 矛盾的逻辑即辩证逻辑。形式逻辑从事物的存在、事物的现有属性出发, 撇开了事物的运动和属性变化。普列汉诺夫把形式逻辑看作辩证思维的个别情况, 犹如静止状态作为运动现象中的特殊一例, 形式逻辑法则同样是辩证思维广阔领域中一个独特的具体表现<sup>[4](84)</sup>。辩证法并未摒弃形式逻辑, 而是剔除了形而上学强加于形式逻辑之上的那些绝对化规律的束缚, 赋予形式逻辑更为灵活与动态的解释空间<sup>[4](87)</sup>。普列汉诺夫认为, 只有伯恩斯坦用“一是和否一否”这个公式所表明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才有这样的毛病, 这种所谓的“一是和否一否”逻辑, 已经放弃了“对立面统一的学说”, 走向了“矛盾融合”和“阶级调和”的资产阶级的立场, 因而是一种真正玷污科学的理论毒瘤<sup>[17]</sup>。

考茨基认为矛盾只存在于思维中, 客观现实中并不存在矛盾。他通过康德的二律背反和运动中的矛盾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矛盾是思维中的逻辑错误, 而不是现实的固有属性。按照考茨基的观点, 从康德的“世界既可以证明是有限的, 又可以证明是无限的”这一二律背反出发, “如果我们把这个主张扭转过来并且认定我们既无法得到世界的有限性的表象, 也无法得到世界的无限性的表象, 那么矛盾就立刻在现实世界里消失了”<sup>[5](159-160)</sup>。考茨基认为, 逻辑思维的这个过程既是辩证法的过程, 也是克服自我和周围世界之间各种对立的过程<sup>[5](153)</sup>。考茨基将思维矛盾视为需要消除的“逻辑错误”, 暴露出其对辩证法中矛盾的误解, 其未能理解认识过程中的矛盾正是客观矛盾在思维中的反映形式。考茨基进而认为理论家的任务就是把新的事实同旧的事实没有矛盾地联系起来。当他将理论家的任务限定为“无矛盾地联系事实”时, 实际上也就消解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批判维度。科学认识恰恰需要揭示理论框架中的结构性矛盾。考茨基混淆了形式逻辑矛盾与辩证矛盾的本质区别, 不理解客观存在的矛盾无法通过思维调整消除。

阿德勒认为矛盾是思维在静态概念与动态经验之间的张力产物, 辩证法的任务是通过概念的流动性消解这种张力, 而非将其投射为世界的本质属性。阿德勒首先区分了马克思主义中“矛盾”的两种不同形式。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 “矛盾”首先指所有思维内容不应被视为僵化的对立, 而应在“流动”中(即通过持续的中介过程)被把握。其次, 矛盾也指事物存在的现实对立性。鉴于思维中的对立中介与事物存在的现实对立性显然不同, 阿德勒建议保留“矛盾”专指思维的中介方法, 而引入“对抗性”(Antagonismus)概念来指称事物内部的现实对立关系<sup>[18]</sup>。阿德勒明确反对普列汉诺夫将矛盾视为存在本身的属性, 他认为, 所谓的“矛盾”并非客观世界的本质特征, 而是思维在把握经验时产生的认知错位。矛盾是思维试图以非连续工具(概念)把握连续经验时的必然产物, 而非世界本身的属性。阿德勒指出, 辩证法的真正精髓不在于混淆这些截然不同的观点(当然, 矛盾也会随之产生), 而在于通过摆脱概念各自的局限性来解决这些矛盾。这不是事物的构成, 而只是一种思考事物的方式<sup>[19]</sup>。阿德勒还批判了普列汉诺夫关于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是从属关系的观点。阿德勒主张二者是认知过

程的不同环节,它们之间根本不存在和谐或矛盾的关系,它们是两种思维方式。形式逻辑通过固定概念解析世界,而辩证逻辑则强调流动性;形式逻辑提供清晰的分析框架,而辩证逻辑则修正其僵化性。

在阐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矛盾规律时,伯恩斯坦、考茨基、阿德勒等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试图从康德主义、实证主义或达尔文主义的视角出发,致使他们的理解出现了根本性的偏差。卢森堡曾指出,第二国际存在两个思潮:一是在哲学上“回到康德”;二是在经济学上“回到亚当·斯密”。伯恩斯坦和阿德勒就属于“回到康德”的那一类。阿德勒认为矛盾是思维的产物,而非存在本身的属性,他仅强调辩证法作为“科学方法”的工具性,而忽视辩证法真正的核心在于物质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康德化的框架是无法容纳这一学说的全部丰富性与批判力量的。在对辩证法基本观念的理解上,考茨基仍然是一个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者、机械论者,而不是辩证论者。考茨基认为,辩证法不过是生物学的适应有限性的反映。他不理解对立统一这一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不理解矛盾问题中的共性与个性、相对性与绝对性的关系问题,更不可能了解辩证的运动即“自我运动”的实质。他把一切都归结为个体同环境的关系。考茨基的哲学是机械论的世界观和相对主义、折中主义方法论的奇怪结合<sup>[11](226)</sup>。普列汉诺夫继承了恩格斯关于辩证法的理解,但是他却没有意识到历史已经前进到要求辩证法改变自己的形态,没有把辩证法向前推进,反而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降低到实证主义的水平。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中批评普列汉诺夫,原因在于普列汉诺夫的实证主义立场混淆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诡辩方法。可见,在矛盾问题上,无论是考茨基将矛盾视为思维错误予以消除,还是阿德勒将其视为认知张力并彻底剥离其存在论基础,抑或伯恩斯坦的“矛盾调和论”,都不同程度地消解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强调的矛盾作为客观历史发展根本动力的革命批判性。普列汉诺夫虽坚持矛盾的客观性,却将其等同于形式逻辑矛盾并归结为“实例的总和”,同样未能深刻把握对立统一规律的精髓。这反映了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在把握辩证法核心问题上的集体困境。

####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适用性问题的争论

在辩证法的适用性问题上,伯恩斯坦质疑辩证法预测未来的科学性。在他看来,靠纯粹的辩证思辨来预测未来社会的发展是极其荒谬的。他指出,若非将这种荒谬置于黑格尔辩证法的语境下去审视,便很难解释为何马克思也会陷入此种“历史的自我欺骗”之中<sup>[9](242)</sup>。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是因为“吸收”了黑格尔矛盾辩证法才犯了错误。他认为,我们应当继承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方法,但必须将辩证法的残余从科学社会主义中剥离。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而是对其本质的回归——让社会主义理论重新植根于现实运动的土壤,而非悬浮在形而上学的云端。他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思想和其余部分(辩证法)分开,强调前者是正确的,而后者则是马克思误解了当代的历史力量。在这里,伯恩斯坦显然是混淆了恩格斯构建的具有普遍主义倾向的辩证思维方法体系与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错误地指责马克思“脱离了具体历史”。当伯恩斯坦试图用实证主义“拯救”马克思主义时,恰恰消解了其革命内核。

普列汉诺夫构建了辩证法的双重本体论基础,将自然与历史统一于辩证唯物主义框架下,强调辩证法既是本体论规律,又是认识论工具。普列汉诺夫指出,鉴于辩证唯物主义聚焦于历史领域,恩格斯有时将其称为“历史的”,此称谓并非为了界定唯物主义的本质属性,而是为了指明其应用范畴之一,即作为解析历史现象的工具与视角<sup>[13](311)</sup>。在普列汉诺夫看来,一切事情都应该由辩证法来审查,辩证法是科学研究工作的灵魂。普列汉诺夫指出:“黑格尔说过,‘辩证法是……科学研究工作的灵魂,

是科学内容借以取得内在联系和必然性的唯一的原则’。”<sup>[12](494)</sup>他提出辩证法的革命性本质在于其“否定性动力学”，即任何有限存在物都必然因其内在矛盾走向自我否定，这种扬弃过程构成发展的根本动力。黑格尔断定，理论不可能预料将来，也不可能提出关于将来的社会发展的的问题。与面向过去的黑格尔辩证法相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则面向现在和将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仅解释过去，而且解释现在，并且预见到新的社会形态的产生。因此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辩证法不仅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客观规律在人的概念中的反映，是观察一切现象的方法，而且是革命改造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理论依据<sup>[19]</sup>。

卢森堡认为，辩证法不仅是研究工具，更是具有未来指向性的思维范式，能够揭示资本主义的动态本质并预见社会主义的未来。马克思通过历史辩证法在经济学领域构建了系统性理论框架。卢森堡认为这种探究方法与思维导向赋予了人们洞察未来新世界的可能，开辟了广阔无垠的独立探索空间<sup>[10](472)</sup>。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视作一个动态的历史进程，不仅追溯其起源，如同古典经济学在巅峰时所展现的那样，更前瞻性地预见到了社会主义的辉煌未来。在卢森堡看来，马克思学说中不朽的神奇钥匙就是其历史辩证法，这种研究方法的应用范围是无限的。历史辩证法能够帮助我们精准理解每一个独立瞬间的全面作用与深远影响，并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全局中审视。唯有在整体框架的参照下，我们才能深刻领悟每个瞬间的真实含义与价值。卢森堡认为，马克思所构建的这一理论体系的本质深刻植根于历史长河之中，其效用虽在时间的维度上展现出一定的局限性，然而其内在逻辑却展现出彻底的辩证性<sup>[10](486)</sup>。它内在地孕育了自我超越、变革的必然趋势，预示着自身演进的不可阻挡的潜力。

考茨基则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只适用于有机界，而不适用于无机界。考茨基指出，任何在现实领域之外进行建构的人，无论他运用辩证法还是回到康德，最终都会陷入沼泽，我们不应该事先假定到处都有作为必然的发展公式的辩证法，而应该在它发生的地方去发现它<sup>[5](147)</sup>。无机界里发生冲突的结果，不一定是合题，更不用说回到出发点上去<sup>[5](141)</sup>。考茨基认为，我们把辩证法的过程主要看作一种精神的过程，看作有认识和有意识的行动的东西对它周围的世界的斗争<sup>[5](153)</sup>。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现实，他们的论点不是从概念中辩证地构建出来的，而是从对现实和他们前辈观点的研究中获得的。他们从来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他们几乎总是主张一种排除这种解决方案的观点。在考茨基看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教导我们，不要把社会看作一个完成的东西，而要把社会看作一个必然按照一定规律发生的复杂过程，还教导我们在经济学中寻找新的社会变革的最终原因，在其中探索运动的驱动力以及我们成功的条件和局限性。

在探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时，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普遍渴望从辩证法中汲取指引现实行动的坚实依据，但无形中将辩证法工具化或教条化，割裂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批判性与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本质，这种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论思维方式具有坚实的现实力量<sup>[20]</sup>。辩证法不是预成论公式，而是通过革命实践不断重构现实的批判武器。

## 五、启示：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可或缺的三个维度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系统化与普及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中将辩证法从黑格尔的唯心体系中解放出来，赋予其唯物主义的自然而与历史基础，构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初步框架。然而，恩格斯的体系化努力也带来了一定的理论风险：一方面，他将辩证法扩展为自然、历史与思维的“普遍规律”，可能导致辩证法的“形式化”与“教条化”；另一方面，

他对“自然辩证法”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马克思所强调的“历史辩证法”与“实践构序”的主体维度。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对恩格斯辩证法的接受与批判正是这一张力的体现。普列汉诺夫继承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传统,却陷入机械决定论;阿德勒则彻底剥离其存在论内涵,将其纯化为认识工具。要真正走出第二国际的理论困境,必须在恩格斯体系的基础上回归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实现自然与历史、思维与存在、方法与存在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

第一,在存在论维度上,若不理解实践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带来的深刻变革,就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蕴含的批判与革命力量。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一种新哲学,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感性的、对象性的实践为出发点的。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都是由这种感性的、对象性的实践构建出来的。全部人类史就是“现实的人”的劳动实践过程<sup>[21]</sup>。马克思指出:“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sup>[22]</sup>这标志着哲学基点的根本转换:不是从抽象的物质或精神出发,而是从人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出发来理解人、世界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基础,不再是一般哲学唯物主义的抽象物质概念,而是人的历史性实践活动作用下的重新构序和赋型的客观世界<sup>[23]</sup>。恩格斯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提供了普遍方法论基础,而马克思辩证法的核心在于实践对历史的构序性——“人通过劳动创造历史”的存在论革命。忽视这一区分,容易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降格为脱离主体的自然决定论。当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成旧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或自然本体论时,就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更谈不上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真正主体是处在一定历史当中、具有一定社会关系的劳动者和实践者,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适用的范围是由“人的历史性实践活动作用下的重新构序和赋型的客观世界”构成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一种人的思维作为有限主体对于作为其对象的实在主体的认识,是人的思维对于头脑之外作为“实在主体”的认知对象的建构过程<sup>[24]</sup>。因此,并不是事物本身是矛盾的,而是我们用辩证法去考察事物时,事物才呈现出矛盾,运动也是如此。辩证法的存在论基础不是某种抽象的物质实体,而是这种在实践活动中不断生成、展开并寻求自我扬弃的现实历史过程。

第二,在认识论维度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是对既定规律的“反映”,而是通过批判性地“穿透”事物的表象,揭示其内在的、历史性的社会关系本质。这条道路的起点,正是实践的思维方式所确立的“此岸性”。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在阐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时,往往将辩证法视为可以脱离具体内容的纯粹“形式”或“工具”,这恰恰落入了马克思所批判的“直观的唯物主义”的窠臼。恩格斯指出,自黑格尔离世以来,鲜有学者尝试在学科内在逻辑的脉络中系统阐述其内容,于他们而言,辩证法“不过是能被机械套用在各类议题上的僵化框架,抑或是填补思维贫瘠与实证知识匮乏时的言辞装饰”<sup>[25](10)</sup>。正如恩格斯所言,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把辩证法看作一种外在的形式,使辩证法变成了“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然而,辩证法要求这样的逻辑:其中形式是富有内容的形式,是活生生的实在的内容的形式,是和内容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形式<sup>[7](77)</sup>。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区别在于,“究竟是现实的活动构成规律,还是先在的规律支配活动”<sup>[26]</sup>。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展现了这一认识道路。他从资本主义社会最普遍的、看似不言自明的“现象”——商品——开始分析,通过运用辩证法揭示了商品拜物教的秘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内容),如何必然地表现为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虚幻形式(形式)?这个过程正如他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所言,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但这“具体”已非感性的杂多,而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在这里,思维的逻辑运动(形式)与事物自身的客观逻辑(内容)是统一的。真理正是在这一层层剥开现象形式、揭示其历史性内容的过程中得以显现的。这完全不同于寻找一个终极答案的静态真理观,而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通过批判假象,让内容自己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动态的“显

现”过程。

第三,在现实的维度上,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关键在于把握历史与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从根本上看,辩证法就是处理历史发展过程与思维逻辑范畴之间关系的方法。恩格斯精辟地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sup>[25][14]</sup>这意味着,逻辑的范畴体系不是思维的任意构造,而是对历史过程进行“修正过”的反映,这种修正使得逻辑得以在纯粹形态上把握历史的内在必然性。马克思将这一原则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在《资本论》中,他展示了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的过程,这恰恰是资本关系历史生成过程在思维中的凝练与升华。逻辑的展开再现了历史的本质。他揭示了资本自身追求无限增殖的逻辑必然地创造出其自身的限制与掘墓人——社会化大生产与无产阶级,从而为自身的否定与扬弃准备好了条件。这种辩证运动根植于资本的具体历史规定性之中。在历史辩证法的视角下,每一种人类生存状态均被视作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现实体现,而所有外部对象亦仅能在其独特的历史语境框架内获得历史性的揭示与展现。换言之,不存在任何超脱于时代变迁的、绝对恒定的社会存在形态,所有社会现实均为历史进程中的暂时性与相对性表现<sup>[27]</sup>。历史辩证法坚决地审视并批判任何试图将某一特定历史架构(如生产方式)绝对化或永恒化的倾向。马克思正是通过破除一切“体系化”幻相或过度要求,使辩证法直面现实问题<sup>[28]</sup>。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在应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指导实践时,恰恰没有重视这一点。而列宁之所以能突破普列汉诺夫的“客观条件”论,是因为他没有将俄国革命视为对某个抽象历史公式的机械应用,而是运用辩证法具体分析俄国作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这一具体的特殊矛盾,把握了其历史发展的独特逻辑,认清了革命的形势与可能性。正如列宁所说,对斗争形式的考察必须置于历史的长河中进行,即需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sup>[29]</sup>。每当我们头头是道地分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一句,我们的分析框架是不是旧的,我们那一套标准是否已经足够先进和解放。在面对新事实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实事求是地去分析新情况,还是习惯性地把成见往新情况上套?我们要分析当下情况的不同,找到新办法、新出路。

## 六、结语

第二国际的这场争论不仅凸显了辩证法在存在论与方法论之间的内在张力,也促使其走向更深刻的现实层面。论争的起点是伯恩斯坦对辩证法科学性与现实适用性的质疑。作为回应,普列汉诺夫与卢森堡等人系统论证了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基础及其革命意涵,捍卫了辩证法的客观性维度。阿德勒进一步阐释了辩证法的形式结构与认识机制,区分了矛盾的不同形态,揭示了量变与质变规律的生成逻辑。如果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辩证法的主要争论在承不承认运动、变化和发展的问题上,那么在第二国际时期辩证法的主要争论则集中在如何理解矛盾和发展的问题上。伯恩斯坦把发展看作没有质变、没有飞跃的进化论,才形成了其“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修正主义口号。考茨基害怕矛盾,极力避免矛盾,最终走向了同伯恩斯坦一样的修正主义道路。不同于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卢森堡利用历史辩证法揭示了资本主义无限积累的矛盾,但是她却走向了一种把矛盾和变化绝对化的相对主义,错误地认为当资本主义确立自身基础的同时就会灭亡,“方生方死”。普列汉诺夫把握住了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然而在十月革命之前,他却认为“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好将来要用它烤成社会主义的面粉”,革命必然失败。阿德勒指出了普列汉诺夫思想中的机械论倾向,然而他却剥离了辩证法的存在论基础,使辩证法退回到了客观唯心主义。总的来说,第二国际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争论,本质上源于他们未能突破传统哲学的认知框架——或将其简化为实证主义的“科学工具”,

或割裂为唯心主义的“思维规律”。这样的阐释必然会遮蔽辩证法的革命内核,消解其作为“改变世界”的哲学力量。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必须首先从存在论维度认识其“新世界观”的实践根基。社会存在本身是在实践中被生产和再生产的历史性过程,辩证法正是这一活生生的、自我否定的实践活动的内在逻辑。其存在论基础是历史的、生成性的社会关系,而非任何抽象的本体。其次,从认识论维度把握其作为批判性认识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并不是中立的认知工具,而是一种批判的和革命的思维方式。辩证法不是“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最后,从现实维度理解其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逻辑并非抽象的思维形式,而是从历史发展最成熟的现实形态中凝结出的本质性结构。逻辑必须始终面向变动着的具体现实,并依循事物在成熟阶段的内在关系来把握历史的真理环节。唯有如此,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整体性。

### 参考文献:

- [1] 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78.
-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伯恩斯坦言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
- [3] 恰根.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哲学修正主义斗争史(1895—1914)[M].林基洲,曾广灿,王锐生,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327.
- [4]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M].汝信,刘若水,何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 [5]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一分册[M].哲学研究编辑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
- [6] ADLER M. Dialektik oder Metaphysik[J]. Der Kampf, 1911, 5(2): 78—85.
- [7] 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8] 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M].谢永康,侯振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5—6.
- [9] 殷叙彝.伯恩斯坦读本[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 [10] 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上卷[M].李宗禹,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11] 刘佩弦,马健行.第二国际若干人物的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 [12]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M].汝信,刘若水,何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 [13]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M].汝信,刘若水,何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 [14] ADLER M. Marx und die Dialektik[J]. Der Kampf, 1908, 6(1): 256—265.
- [15] 饶勒斯.饶勒斯文选[M].李兴耕,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6] 普列汉诺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M].汝信,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278.
- [17] 姚顺良.资本主义理解史:第二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285.
- [18] ADLER M. Lehrbuch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I[M]. Berlin: E. Laub, 1930: 37.
- [19] ADLER M. Marxistische Probleme[M]. Stuttgart: J.H.W. Dietz Nachf., 1913: 97—98.
- [20] 朱雪微.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论本质和现实力量[J].哲学研究,2023(7):13—22.
- [21] 谌中和,宣博方.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主体路径的超越[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1(4):32—41.
-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0.
- [23]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一种方法论上的学术历练:列斐伏尔《马克思主义的当前问题》研究[J].哲学研究,2024(4):22—30,125.
- [24] 王南湜.作为独特科学建构逻辑的《资本论》辩证法何以可能? [J]. 社会科学文摘,2024(5):26—28.
-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6] 孙正聿.辩证法:黑格尔、马克思与后形而上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8(3):28—39,204.
- [27]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441.
- [28] 田海平,郭友兵.“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何以形成:从黑格尔、马克思到后形而上学思想[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1(1):1—13.

[29] 列宁全集: 第 1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2.

## The debate on Marxist dialectics by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and its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XIE Yazhou, YANG Jingqin

(School of Marxism,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clashes over Marxist dialectics during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period marked a pivotal juncture 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Marxism. Revisionists led by Bernstein viewed dialectics as a fatal flaw in Marx's theoretical system. In response, orthodox theorists such as Plekhanov and Luxemburg mounted a systematic defense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the ontological foundation, the law of quantitative change turning into qualitative change, and the law of contradiction—emphasizing the dual nature of dialectics as both a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 and a guide for revolutionary action. However, while orthodox theorists effectively defended the objective materialist foundation of dialectics, they collectively fell into the traps of mechanical determinism and positivism: Plekhanov equated dialectical contradictions with natural phenomena, Adler stripped dialectics of its ontological substance to reduce it to an epistemological tool, and Kautsky drifted toward Darwinian evolutionism. These theoretical limitations confined their interpretations of new capitalist forms to the predicaments of economic determinism and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ultimately diluting dialectics' critical and revolutionary essence. To fully grasp Marxist dialectics, one must be grounded in understanding in three dimensions: ontologically, returning to the ont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practical philosophy to affirm the structuring role of subjective practice in the objective world; epistemologically, reconstructing the unity of dialectics' content and form to reveal its essence as critical cognition; and realistically, upholding the principle of unifying history and logic to apply and develop dialectics within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s.

**Key words:**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dialectics; Plekhanov; Max Adler; revolution

[编辑: 胡兴华]